

10.13

吴江文史资料

第七辑

88



目 录

· 纪念王绍鏊诞辰一百周年 ·

1. 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
.....徐伯昕 葛志成 梅达君(1)
2. 王绍鏊同志传略.....林芷茵(7)

· 人物春秋 ·

3. 职业外交家施肇基博士传略.....李廉深(50)
4. 爱国教育家沈体兰先生.....同川生(56)
5. 蔡寅生平.....郑维仁 陆廉德(63)
6. 苏曼殊在盛泽.....沈晒之(68)
7. 同川小学和金松岑.....任传济(73)
8. 笔耕一生的范烟桥.....任嘉尧(80)
9. 中国早期的电影明星殷明珠.....王 炜(83)
10. 弹词名家刘天韵李炳华(85)
11. 沈月箴传平望镇志办公室(89)
12. 清代名医徐灵胎费原子(91)
13. 徐灵胎先生墓重修记蒯伟勇(94)

· 事件与回忆 ·

14. 追记芦苇厍大屠杀陆景宣 金 冶(96)
15. 记党的外围组织——黎里鬻商社和它的《浅作》

- 平静人(108)
16. 烈上碑前话英雄 再生精神与世同...徐恩常 朱奎林(115)
17. 溪港抗租记.....平望镇志办公室(120)

· 丝绸史话 ·

18. 绸乡颂.....汪钦成(124)
19. 费达生与土丝改良运动.....周德华(125)
20. 早期的丝绸职业教育.....周德华(134)
21. 绸乡的合作经营方式.....姚天吟(137)

· 教育与文艺 ·

22. 吴江师范沿革和学习生活的回忆.....徐 深(144)
23. 同里中学校史简述.....任传济(150)
24. 木偶唱昆曲 省内属罕见.....费子文(154)
25. 吴江最早的电影院.....吴国樑(158)

· 经济与社会 ·

26. 同里米业史话.....王稼冬(160)
27. 二十年代同里的新兴事业——同里兴业电气厂和苏
同轮船.....孙君正(167)
28. 吴江建国前的报刊概况.....解根生(173)
29. 盛泽育婴堂琐忆.....王企曾(182)

· 风 土 志 ·

30. 双杨阳会.....周德华(184)
31. 黎里油墩.....王 炜(187)
32. 平望丝网.....平望镇志办公室(189)

33. 同里闵饼.....任传济(190)
34. 鲈乡说鲈.....沈昌华(192)
35. 十样景奇观 圆通庵盛会.....徐恩常 朱奎林(196)

· 文物古迹 ·

36. 什么是文物.....县文管会(199)
37. 文物的价值与作用.....县文管会(201)
38. 吴江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县文管会(205)
39. 平波台.....平望镇志办公室(211)
40. 吴江公园小史.....曹培培(214)

· 作者 读者 编者 ·

- 关于罗星洲建筑年代的补充.....王稼冬(218)
- 对《同里“谷香村”茶食糖果店创业琐谈》的几点意见
.....孙君正(220)
- 更正.....平静人(220)
- 说明.....本会(220)

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

徐伯昕 葛志成 梅达君

王绍鏊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是从为民主主义革命到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一生。1970年3月31日他逝世时，我们党和国家正在十年动乱之中，我们没有机会向他表示内心的哀思；而今我国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我们的国家充满朝气的日子里，更增加了我们对王绍鏊同志的深切怀念。

王绍鏊同志于188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字却尘，取除却尘俗、胸怀大志的意思。青年时期，他曾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因家境清贫，得亲友资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正值辛亥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因不满同盟会中有人刺杀了陶成章，就同章太炎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后改为“统一党”。他曾亲去南京晋谒孙中山先生，面陈革命方略。不久，他参加了第一届国会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宪法起草活动。1913年11月，北洋政府下令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王绍鏊同志愤然南归。以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王绍鏊同志积极参加了讨袁护法运动。袁世凯失败，但继续上台执政的还是北洋军阀，搞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绍

鑒同志义愤填膺，毅然主张和孙中山合作。他独自到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1923年，北洋军阀曹錕演出贿选丑剧，王绍鑒同志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议员二十人，断然拒选。后来他又运用国会内的各种关系，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錕妄图强制国会通过丧权辱国的法案，遭到曹錕的通缉。他逃出北京后，仍然积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当广州国民军即将北伐时，他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被军阀孙传芳侦知后，又遭到通缉。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人们欢呼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投降了敌人。而王绍鑒同志在严重困难面前，凛然不惧。在武汉时，他阅读了许多进步的小册子。回到上海，又买了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刻苦研读。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他，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更使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在自传里写道：从此他认识到“要除掉中国社会的病根非彻底革命不可”，“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任何政治的改革，绝没有办法”。因此，他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绍鑒同志在上海邀集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了“救国协会”。他尽力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款，支援军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他立刻赶去参加，表示声援。以后，王绍鑒同志还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他的上海寓所，经常宾客

满座，他慷慨陈词，宣传抗日救国，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卖国反共的罪行。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1936年6月，王绍鏊同志到北方去策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加入抗日倒蒋的联合行动，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监狱囚禁期间，敌人对他施尽威胁利诱的伎俩，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营救出狱。此后，王绍鏊同志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抗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王绍鏊同志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繁重而艰险的任务，但他英勇无畏，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阴谋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并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疯狂扩大内战。王绍鏊同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斗争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叙伦等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与此同时，加入民进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张纪元同志等还合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同志担任校长。于是这所中学就成了民进同志经常集会、商讨问题、推动民主运动的场所。

王绍鏊同志交友广泛，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有密切联系。当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同时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寓所，经常有文教界、工商界、职工界、学生界的进步朋友来往，谈论国内外形势，或商讨如何开展民主运动的问题。

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民进与上海四十七个主要的人民团体于1946年5月5日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后来发展到六十八个团体，包括各界群众四十

万人。王绍鏊同志被选为联合会的理事。他对这个联合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很多实际的组织工作。直到一年以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1946年6月，国共在南京和谈面临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的阴谋更加暴露，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联合所属各团体在6月23日发动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盛大集会，欢送以马叙伦同志为团长、包括雷洁琼同志在内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王绍鏊同志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他和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同志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尽管一路有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他和其他负责同志始终从容不迫地按照预定计划，步行十余里，把队伍带到复兴公园解散，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自此以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发起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王绍鏊同志无不带头参加，并且主持了其中许多群众性的集会，作了鼓动人心的演讲，对推动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王绍鏊同志被迫在党的关怀下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先后转移到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不懈的斗争。同时，王绍鏊同志用秘密通讯的方式指导在上海的民进同志坚持斗争。他在给上海民进同志的信中强调：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这对当时留在上海的民进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更

提高了大家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48年，党中央发出“五一”号召，民进在香港的领导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随后，王绍鏊同志和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积极参加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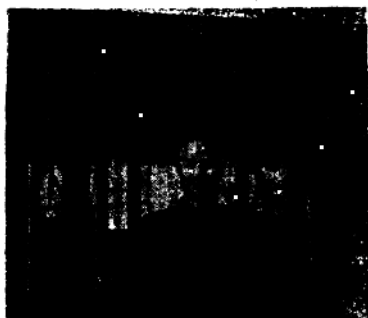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同志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他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竭智尽忠，提出有益的意见。他多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赴各地参观调查，并对民进地方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受到各地会员和群众的欢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特别强调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成就、一切作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必须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道路不断前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一再向党的领导建议，要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使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王绍鏊同志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生活朴素。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所以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使自己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因为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不过是剥削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装饰品，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反动阶级的政权性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达到富强，中国革

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党分配他做任何工作，他从不畏难，总是力争完成。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抗日战争年代，他两次毁家纾难，生活十分艰苦。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己奉公，从未因个人问题向公家提出要求。临终时，他还嘱咐家属把他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都交给组织。王绍鏊同志这种勤于学习、严于律己、不计名利、克己奉公、为革命事业而贡献一生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编者按：

今年1月9日，是我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绍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年初，中央民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会。为表示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之情，特发表文章两篇以资纪念。



王绍鏊传略

林芷茵

(一)

1888年1月9日(清光绪十三年农历十二月八日)，王绍鏊诞生在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一个已经中落的书香之家。

同里是一个古老秀丽的小镇。它四面环水，地处泽国之中，是江南有名的水上小镇。远在唐朝即以物产富庶和舟楫之利名闻天下。宋元以降，这里出了许多名臣文人，聚居众多的书香世家，其中以明清为尤。至今同里还保存有不少构筑精巧的明代建筑，如尚义堂、嘉荫堂、崇本堂等，而退思园更以它的玲珑精致而远近闻名。同里王姓就是这个古老小镇上有渊源声望的一个大族。相传他们是明代辅国大臣王鏊的后代。王鏊，字济元，苏州吴县人。明成化进士，弘治时充讲官，时内珰涉政。王鏊常直言谏说，一次阉臣引帝游西苑，几沉犬马酒色中，鏊闻后以文王不盘于游田的故事规劝，情真意切，弘治不由为之动容。正德初，与大臣韩文、刘健等入疏请诛内臣“八党”，颇获众望，旋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刘瑾擅权，构陷忠良，流祸缙绅，鏊在帝前仗义执言，倾力相救忠贞之士。但刘瑾权势炙炽，鏊在阁中影单力孤，遂乞罢归里，杜门读书著述十四年。嘉靖三年复出，未几病逝。王鏊为人刚正不阿，才学超群，深得后人称

誉。死后谥文恪，葬苏州西郊七子山上。他的后裔有一支迁居吴江同里镇，这就是王绍鏊的一族。到王绍鏊出生时，王家已经中落。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意即望他继承先租王鏊之业；后王绍鏊取字恪成（后改却尘），也是继承先祖文恪公的意思。每年清明，同里的王姓族人，总要结队乘船去七子山扫墓祭祖。王鏊墓寝规模颇大，四周松柏围绕，墓前道旁立有石人石马及华表柱。王绍鏊幼年时，常随长辈们去七子山祭祖。那隆重肃穆的仪式，令人肃然起敬的颂祖祭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模糊地感到，做人应该象长眠地下的祖先一样，做一个刚直有为的人。

王绍鏊的曾祖和祖父都曾当过地方小官，而他的父亲却一直不仕，在镇上当了名中医。那时行医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他热心为乡亲治病，也颇有人缘。不幸在绍鏊四岁时，便早逝了，遗下绍鏊兄妹二人。因此王绍鏊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在他懂事的时候，接触的只是治家严格、办事几近刻板的祖父和慈祥温顺的母亲。祖父对失怙的孙子并不特别宠爱，他只希望孙子苦读经书，早成举子业，可以光宗耀祖。因此在王绍鏊幼小的时候便启蒙开馆，逼他读诘屈聱牙的四书五经。这对年幼体弱、经常生病的王绍鏊来说，自然是一件乏味枯燥的事，幸亏他有一位慈祥开明的母亲。

王绍鏊的母亲也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治家有方。年轻守寡以后，她便把自己全部精力和希望倾注在孩子身上，培养他从小立大志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她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如苏武使匈奴、薛仁贵东征、杨家将、岳飞抗金、文天祥等，凡历史上爱国志士，民族英豪可歌可泣的故事，她都能背诵出来。她经常给儿子讲这些故事，讲到感人之处，往往垂泪而述。有些故事反复讲述，在儿子的心扉上印下了深深

的印痕。王绍鏊在以后常对人说，我母亲是我第一个真正的老师，他特别忘不了母亲讲的范文正公的故事，从那时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成了他反复吟诵的座右铭，并且一生矢志不移地照此去做，

其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殖民者的大炮和资本的冲击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地学会兴起，鼓吹变法图强，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维新，一系列的风云变化，使中国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这阵风也吹进了江南水乡同里镇。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纷纷议论，这些新鲜的东西吸引了年幼的王绍鏊。他对祖父逼他死记硬背的“天地玄黄”，“关关雎鸠”之类毫无兴趣，却津津有味地读起了康梁的时论文章。十二岁时竟以初生牛犊架势，写了篇《变法论》，引经据典，提出了“世无百年不变之法”的观点。这自然引起了长辈们的震惊和害怕，祖父连忙召他去，禁止他再接触那些异端邪说。可是，新的思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势不可挡。1902年，同里镇上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金松岑先生在家乡创办了新学——同川学堂，吸引了附近有志者纷纷前来求学。黎里镇的柳亚子也慕名而来。王绍鏊也偷偷报名入学。不久祖父闻知，大为震怒，迫令他退学。王绍鏊自然不敢反抗，只得恋恋不舍地回家继续背读经书。十七岁时王绍鏊进了县学，取得了秀才的称号，祖父这才宽容地对他说，“你已经清偿我的书本债了，以后你可以自由求学”。第二年，祖父去世，他就象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终于可以在广袤的天空中振翅自由翱翔了。

当时在一些有志青年中间，流行着“科学救国”的幻想，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科学不发达，要摆脱贫困落后、处处挨打的局面，只要象西方国家一样，办工厂，开矿藏，造出众多的机器枪炮就行。王绍鏊也不例外，他在同川学堂时，曾接触了数理化等知识，这些前所未闻的新鲜学问，使他大开眼界，并激起他进一步探索的欲望。祖父去世后他又重新捧起这些书籍。不久，金松岑、薛公侠两先生在吴江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专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王绍鏊得知后，又立即报名参加。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学习热情却一天天低落。原来，清政府的腐败状况日益加剧，列强对中国的凌辱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开始勃兴。他们已不满足于变法改良的做法，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权的革命主张。章炳麟(太炎)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王绍鏊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心头不禁涌出疑问：如果不从政治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依靠科学技术发达，能行吗？他不由陷入沉思。一次，他偶然读到了一本由卢弼、黄炳言译的日本清水澄著的宪法书。这是一部介绍西方国家议会政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进步书籍。王绍鏊立刻被吸引住了。他越读越觉得有道理，对，让有识之士制定一部宪法，政府办事就有了根据，百姓也有了说话的权利，那么许多事情就不至搞得这么糟，国家也就有望了。他兴奋不已，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救国富民的正确道路，于是放弃了对理化的研究，考入江苏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如饥似渴地探索新的知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议会政治，内阁制度等都成了他研究的课题。讲习班一年就结束了，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萌生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念头。但此议一提出，立即遭到族里许多人的反对。原来两年前他已奉命和同里的殷爱珍女士成

婚，第二年得了长女佩德。照族里规矩，有了妻室老小，理应谋个职业安分守己地在家守业，现在居然想出洋，岂不是异想天开？族里长辈，同辈兄弟纷纷指责他，挖苦他。王绍鏊却不甘罢休。但要出国求学，则要争取支持，因为自祖父死后，他家的经济权已经操在别人手里，他和母亲及妻女实际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如今要出洋，首先要有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

这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她深明大义，对儿子的鸿鹄大志十分理解。虽然内心并不舍得唯一的儿子远离膝下，但她还是克服了感情上的绊羁，支持和帮助儿子实现大志。她毅然卖掉了自己的陪嫁田，数目还不够，她又亲自出面，用合会的方法去亲友中筹措。亲友并不热心，费了大力好不容易凑到大部分，最后还剩下一份无人承担。王绍鏊就托姑父去向一位胞叔说情，请他承担，胞叔拒绝了，眼见着功败垂成，年轻的王绍鏊越想越觉悲痛，禁不住在胞叔面前放声大哭。胞叔见侄子求学之心如此强烈，自己不能不助了，于是改变初衷，慷慨允诺。

1908年夏，王绍鏊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东渡的旅程。到日本后，他用很短的时间克服了语言障碍，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思想空前活跃，常常三五成群议论国是，各种思想相互论辩。除了激进的革命派和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外，还有相当数目的人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感兴趣，幻想中国最好也能实现这种制度。这些人虽不参加革命组织，但在图革求变的思想上同革命派则是一致的，特别当后来保守派的保皇咀脸日益暴露后，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逐步都站到了革命派一边。王绍鏊就属于

这一类的人。在日本他一面不断探索新的思想，一面认真苦读。三年后(1911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

(二)

当时国内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革命团体频繁活动，积极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尝试。王绍鏊一踏上祖国大地，立即受到浓烈的革命气氛的感染，周身热血沸腾，回家乡后不几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上海。

是年10月，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政府的总号角，随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土崩瓦解。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尚未集结，革命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尚未占优势地位。这时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相号召。章原是光复会首脑，又是誉满全国的国学大师，很有号召力。

王绍鏊对太炎先生敬慕已久。在上海见面后，彼此观点十分相投。章很欣赏王的气度和才识，就邀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不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章炳麟叫王绍鏊陪同，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

这是王绍鏊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识和温和庄重的领袖风度，使王绍鏊无限敬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中国革命要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各种政治力量集其麾下，同心协力，就一定能成功。

可事情的发展大出王绍鏊意料之外。正当中国革命需要在孙中山领导下联合各革命力量通力合作，以遏制大野心家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的关键时刻，章炳麟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原来，早先章炳麟和孙中山、黄兴合作共建同盟会，也

是求同存异，在许多问题上一直互有龃龉，及至1911年12月，上海都督陈其美（同盟会员）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中山先生派人刺死了光复会军事首领陶成章（章炳麟为光复会首脑），便激化了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由于章的偏见，更主要是他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章炳麟便不再和他合作，而这正中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1912年元月30日，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到一月，章炳麟便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立宪派张謇、熊希龄以及前清旧官僚程德全等组织的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从而改变了团体的性质。这些情况当时王绍鏊并不清楚，他应太炎先生之邀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他逐渐了解到了统一党的内幕，原来它暗中受操纵于袁世凯，袁通过他安插在统一党内的亲信张弧，利用张担任会计科主任干事的方便，提供了统一党的大部分经费，从而使统一党俯首听命于袁，这事使王绍鏊十分震惊。但事已如此，他初来乍到，势单力薄，只能暂且忍耐。不久，统一党为加强实力，又欲与其他政团合并。这时在究竟和什么政团合并的问题上，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张謇、程德全为首的前清遗孤竭力主张与袁世凯的另一御用团体国民协进会和拥戴黎元洪的民社派合并，而另一部分人则力主与进步的统一共和党提携合作。这时王绍鏊不再随波逐流了，他审度时势，认清统一党决不能和民社派之类合并，于是不顾熊希龄等的阻拦，联络党内四川人黄云鹏等青年，组成“少壮派”。但他们太幼稚了，无论从政治基础，社会影响，还是组织实力，他们都远非是张謇、程德全等的对手。1912年5月，统一党终于还是和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等合并成共和党，在北京成立本部，推黎元洪为理事长，